

斯 大 林

列 宁 主 义 問 題

第 七 分 冊

人 民 出 版 社

論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問題

“紅星报”⁹³ 第 16 号刊載的“消灭富农阶级”一文一般說来无疑是正确的，但有两个地方說得不确切。我认为必須予以糾正。

1. 該文說：

“在恢复时期，我們实行了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从改造时期开始，我們就从限制的政策过渡到排挤他們的政策了。”

这种論斷是不对的。限制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和排挤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政策。这是同一个政策。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是限制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即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的必然結果和組成部分。不能把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同排挤富农阶级看成一样。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是排挤和战胜那些受不住稅收压力、受不住苏維埃政权的种种限制办法的富农个别队伍。很明显，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不能不导致排挤富农个别队伍。因此，排挤富农个别队伍不能不看做是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的必然結果和組成部分。

我們不仅在恢复时期实行了这个政策，而且在改造时期，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以后的时期，在我們党的第十六次代表會議(1929年4月)时期，以及在这次代表會議以后直到1929年夏季，我們也都实行了这个政策；而从1929年夏季起，我們进入了全盘集体化阶段，开始了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方面的轉变。

如果看一看党的最重要的文件，例如从1925年12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见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決議⁹⁴）到1929年4月第十六次代表會議（见“关于发展农业的途径”的決議⁹⁵）这个期间的文件，那就不能不看出，“限制富农剥削趋向”或“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論点总是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克服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論点同时并提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說，党沒有把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同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即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分开。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及第十六次代表會議完全是站在“限制农业资产阶级的剥削趋向”（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決議⁹⁶）这一政策的基础上，站在“采取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办法”（同上）这一政策的基础上，站在“坚决限制富农剥削趋向”（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五年計劃的決議⁹⁷）这一政策的基础上，站在

“向富农进攻”即“进一步地、更有步骤和更坚决地限制富农和私商”（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这一政策的基础上，站在“更坚决地从经济上排挤”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⁹⁸）这一政策的基础上。

因此，（一）该文作者把限制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和排挤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说成两个不同的政策是不正确的。事实说明，这里只有一个限制资本主义的总的政策，而排挤富农个别队伍是这个政策的组成部分和结果。

因此，（二）该文作者断言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只是在改造时期，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时期才开始的，这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无论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即在恢复时期，还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即在改造时期，排挤都是有的。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时期，只是用新的补充办法加强了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因此，对富农个别队伍的排挤也就必然加强了。

2. 该文说：

“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完全是从排挤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后一政策在新阶段上的继续。”

这种论断是不确切的，因而也是不对的。当然，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由以前限制即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整个时期准备好的。但这

还不是說，它和限制(和排擠)农村資本主义分子的政策沒有根本區別，它似乎是限制政策的繼續。像我們的作者那样說，就是否认从1929年夏季起在农村发展中所发生的轉变。那样說，就是否认这个时期內我們在我們党的农村政策上实行了轉变的事实。那样說，就是給我們党內的右傾分子造成一种思想上的护符，因为右傾分子现在正抓住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決議来反对党的新政策，就像过去弗魯姆金抓住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決議来反对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政策一样。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加强限制(和排擠)农村資本主义分子的政策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它的出发点是：虽然对富农实行了这种限制，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在相当时期内还是要繼續存在的。根据这一点，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保留土地租佃法，虽然明知道大多数租佃者都是富农。根据这一点，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保留农村雇佣劳动法，要求切实执行这个法律。根据这一点，再次宣布了不准剥夺富农财产。这些法律和这些決議是否同限制(和排擠)农村資本主义分子的政策抵触呢？当然不抵触。这些法律和这些決議是否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抵触呢？当然是抵触的！因此，现在在全盘集体化的地区就不得不把这些法律和这些決議擱在一边，而全盘集体化的范围不是逐日扩大而是逐时扩大的。况且，这些法律和这些決議已經被全盘集体化地区集体农庄运动的进程

本身擱在一边了。

既然如此，能不能斷言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是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的继续呢？显然不能。

該文作者忘記了：如果把生产工具和土地自由使用权**保留在**富农阶级手里，如果在我们的实践中**保存**农村雇佣劳动法和土地租佃法并禁止剥夺富农财产，那末用稅收和其他任何限制办法都是不能排挤富农阶级的。作者忘記了：在实行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时只能指望排挤富农的个别队伍；这和在相当时期内**保存**富农阶级并不抵触，相反地，倒是預計到这一点的。要排挤富农阶级，单靠限制和排挤富农个别队伍的政策是不够的。要排挤富农阶级，必須在公开的战斗中**击破**这个阶级的反抗，**剥夺**这个阶级所賴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基础（土地的自由使用、生产工具、租用土地、劳动雇佣权等等）。

这就是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方面的**轉变**。否則关于排挤富农阶级的談論就只能是合乎右傾分子的心意并对他們有利的无謂空談。否则就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农村集体化，更談不到全盘集体化了。我們农村中的那些正在粉碎富农而实行全盘集体化的貧农和中农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看来我們的某些同志还不了解这一点。

因此，目前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并不是旧政策的繼續，而是从限制（和排挤）农村資本主义分子的旧政策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方面的轉变。

載于1930年1月21日“紅星报”
第18号

“斯大林全集”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
第12卷第156—160頁

勝利冲昏头脑

(論集体农庄运动的几个問題)

现在大家都在談論苏維埃政权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的胜利。甚至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我們获得了重大胜利。这些胜利确实是伟大的。

截至今年2月20日，苏联全国50%的农戶已經集体化了，这是事实。这就是說，截至1930年2月20日，我們已經超額完成了集体化五年計劃的一倍以上。

截至今年2月28日，集体农庄已經收藏了春播用的种子3600多万公担，等于計劃的90%以上，約合22000万普特，这是事实。不能不承认，在粮食收购計劃順利完成以后，单是集体农庄方面就收藏了22000万普特种子，这是一个极大的成就。

这一切說明什么呢？

說明**农村向社会主义的根本轉变可以认为已經有保障了。**

无須証明，这些胜利对于我們国家的命运，对于作为我国領導力量的整个工人阶级以及对于党本身都有极大的意义。姑且不說直接的实际結果，这些胜利对于党本身的內部生活，对于我們党的教育也是有巨大意义

的。这些胜利鼓起了我們党的勇气和对自己力量的信心。这些胜利用相信我們的事业必胜的信念武装了工人阶级。这些胜利把千百万新的后备力量吸引到我們党的周围。

因此，党的任务是：**巩固既得的胜利，有計劃地利用**这些胜利以求进一步的前进。

但是，胜利也有它的阴暗的一面，特別当它是比較“容易地”，所謂“出乎意料之外地”得到的时候。这样的胜利有时使人产生自負和驕傲的心理：“我們什么都能干！”“我們什么都不在乎！”这些胜利往往使人陶醉，人們也就开始被胜利冲昏头脑，丧失权衡輕重的知觉，丧失了解现实的能力，出现过高估計自己力量而过低估計敌人力量的趋向，出現想“一下子”解决社会主义建設中的一切問題的冒险企图。这样也就不会关心**巩固既得的胜利**和**有計劃地利用**这些胜利以求进一步的前进。为什么我們要巩固既得的胜利呢，我們就这样也能“一下子”跑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因为“我們什么都能干！”“我們什么都不在乎！”

因此，党的任务是：和这种对事业有害的危险情緒作坚决斗争，把它从党内清除出去。

不能說这种对事业有害的危险情緒在我們党的队伍里有什么广泛的散布。但是，这种情緒在我們党内毕竟是有的，而且沒有根据可以断定說这种情緒不会加强起

来。如果这种情緒在我們这里得到公认，那末毫无疑问，集体农庄运动就会大大削弱，这个运动被破坏的危险就会成为现实。

因此，我們报刊的任务是：有系統地揭穿諸如此类的反列宁主义的情緒。

举几个事实來說。

1. 我們的集体农庄政策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政策是以集体农庄运动的**自愿原則**和**估計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則为依据的。决不能用强力去建立集体农庄。这样做是愚蠢的和反动的。集体农庄运动应当依靠基本农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决不能把先进地区集体农庄建設的一套做法机械地搬到落后地区去。这样做是愚蠢的和反动的。这样的“政策”一下子就会破坏集体化思想。在规定集体农庄建設的速度和方法的时候，应当周密地估計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

在集体农庄运动中，我們的产粮区走在一切地区的前面。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在这些地区我們有最多的已經巩固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通过这些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农民已經有可能相信新技术的力量和意义，相信新的集体經濟組織的力量和意义。

第二、因为这些地区在粮食收购运动中有两年反富

农斗争的經驗，这不能不有助于集体农庄运动。

最后，因为这些地区最近几年来从工业中心得到了大批优秀干部。

能不能說其他地区，例如消費地区（如我国北方各区）或者还落后的民族居住的地区（如土尔克斯坦），也具备了这些特別有利的条件呢？

不，不能这样說。

很明显，和自愿原則一样，估計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則是健康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最重要前提之一。

而我們的实际情况有时又是怎样呢？能不能說自愿原則和估計到地方特点的原則沒有在某些地区遭到破坏呢？不，可惜不能这样說。例如大家知道，在北方某些消費地区，立即組織集体农庄的有利条件比产粮区要少些，但是人們往往竭力用对集体农庄运动的官僚式的命令手段，用发展集体农庄的紙上決議，用組織实际上还不存在但是已經有一大堆吹牛的決議說得它好像“存在”的紙上集体农庄，來代替組織集体农庄的准备工作。

或者拿土尔克斯坦某些地区來說，那里立即組織集体农庄的有利条件比北方消費地区还少。大家知道，在土尔克斯坦某些地区已經有人企图用武力威胁的办法，用不供給暫时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灌溉用水和工业品的威胁办法来“赶上并超过”苏联各先进地区。

在这种普利施別也夫下士^① 的“政策”同党在集体农庄建設事业中以自愿原則和估計到地方特点的原則为依据的政策之間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很明显，它們之間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絲毫共同之处。

誰需要这种歪曲，这种对集体农庄运动的官僚式的命令手段，这种对农民的可耻的威胁呢？除了我們的敌人，誰也不需要！

这种歪曲会造成什么結果呢？会加强我們的敌人而破坏集体农庄运动的思想。

以“左派”自居的制造这种歪曲的人事实上是在帮助右倾机会主义，这不是很明显嗎？

2. 我們党的政治战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它善于在每一个时机找出运动的基本环节，抓住了这个基本环节，然后就把整个鏈条拖向一个总的目标去解决任务。是否可以說党在集体农庄建設体系中已經找出了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呢？是的，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說。

这个基本环节是什么呢？

也許是共耕社吧？不，不是共耕社。生产資料还没有公有化的共耕社是集体农庄运动中已經过时的阶段。

也許是农业公社吧？不，不是公社。公社在目前还是集体农庄运动中的个别现象。把这种不仅生产公有化而

^① 指俄国作家契訶夫所写的短篇故事“普利施別也夫下士”中的主人公。他驕傲自大，愚昧无知，蛮不讲理，干涉他人自由，想压制和窒息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譯者注

且分配也公有化的农业公社作为**主要形式**，条件还没有成熟。

在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即现在应当抓住的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形式**，就是**农业劳动組合**。

在**农业劳动組合**中实行公有化的是基本生产資料，主要是谷物业方面的基本生产資料：劳动、土地使用、机器和其他农具、耕畜以及經營用的建筑物。在农业劳动組合中**不实行公有化**的是：宅旁园地（小菜园、小果园）、住宅、一部分产乳牲畜、小牲畜、家禽等等。

劳动組合是**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因为它解决谷物問題的最适当的形式。而谷物問題又是**整个农业体系中的基本环节**，因为不解决谷物問題就不能解决畜牧业（小牲畜和大牲畜）問題，也不能解决給工业提供主要原料的技术作物和特种作物問題。正因为如此，农业劳动組合在目前时期是集体农庄运动体系中的基本环节。

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它的最后定本今天公布了^①。

我們党的和苏維埃的工作人員也应当从这一点出发，他們的職責之一就是切实研究这个章程并彻底实行这个章程。

党在目前时期的方針就是这样。

能不能說党的这个方針在实行时沒有遭到破坏和歪

① 1930年3月2日“真理报”。

曲呢？不，可惜不能这样說。大家知道，在苏联某些地区，爭取集体农庄存在的斗争还远沒有结束，劳动組合还没有巩固，但是有人企图跳出劳动組合的范围，一下子跳到农业公社。劳动組合还没有巩固，但是他們已經在使住宅、小牲畜和家禽“公有化”，而这种“公有化”也就变成了紙上的官僚主义的命令，因为现在还没有使这种公有化成为必要的条件。他們这样做，彷彿谷物問題在集体农庄中已經解决，它是已經过时的阶段，目前时期的基本任务不是解决谷物問題，而是解决畜牧业和养禽业問題。試問，誰需要这种把集体农庄运动的各种形式搅成一团的魯莽“工作”呢？誰需要这种愚蠢的对事业有害的急躁冒进呢？当谷物問題還沒有解决，集体农庄的劳动組合形式還沒有巩固的时候，拿住宅、全部产乳牲畜、全部小牲畜和家禽的“公有化”来戏弄集体农民，——这样的“政策”只能合乎我們的死敌的心意并对他們有利，这难道还不明显嗎？

在这种热心的“公有化者”当中，有一位竟向劳动組合下命令，責令“三天之内把每个农戶的家禽总数統計出来”，設置專門的“指揮員”来指揮統計和監督工作，“占領劳动組合中的制高点”，“指揮社会主义战斗，不得离开崗位”，而——当然的事——把整个劳动組合紧握在拳里。

这是什么呢，是領導集体农庄的政策还是瓦解集体农庄和破坏集体农庄威信的政策呢？

至于那些从拆下教堂的钟着手組織劳动組合的所謂“革命家”，那就更不用說了。把钟拆下，——这該是多么革命呵！

在我們队伍里怎么能产生这种“公有化”方面的魯莽儿戏，这种想跳过自身的可笑企图，这种目的在于迴避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实际上是帮助我們的阶级敌人的企图呢？

它們只有在我們集体农庄建設战線上“容易地”和“出乎意料之外地”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能产生。

它們只有在一部分党员产生了魯莽情緒，认为“我們什么都能干！”“我們什么都不在乎！”的情况下才能产生。

它們只有在我們的某些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暫时丧失了清醒的理智和冷靜的眼光的情况下才能产生。

为了糾正我們在集体农庄建設方面的工作路線，必須消除这种情緒。

这就是党的当前任务之一。

领导的艺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落在运动后面，因为落在后面就是脱离群众。但是也不能跑得太远，因为跑得太远就是失掉群众而使自己孤立。誰想领导运动而同时又保持和千百万群众的联系，誰就应当进行两条战線的斗争——既反对落后的人，又反对跑得太远的人。

我們党所以强而有力和不可战胜，就是因为它在領導运动的时候善于保持和加强自己同千百万工农群众的联系。

載于 1930 年 3 月 2 日“眞理报”
第 60 号

“斯大林全集”1955 年人民出版社版
第 12 卷第 167—174 頁

答集体农庄庄員同志們

大家从报上知道，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①一文和中央的“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綫”⁹⁹的著名決議在集体农庄运动的实际工作者中間引起了很多反应。因此，近来我收到了庄員同志們的許多來信，要求答复信中所提出的問題。本来我应当以私人通信方式答复來信。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半數以上的來信沒有写明寄信人的地址(忘記写地址了)。可是，信中所涉及的問題对于我們所有的同志都有莫大的政治意义。此外，当然我也不能不答复那些忘記写明自己地址的同志。因此，我不得不从来信中挑出一切必要的問題，公开地即在报刊上答复庄員同志們的來信。加上中央对此已有直接的决定，所以我就更乐意这样做了。

第一个問題：在农民問題上发生錯誤的根源在哪里？

答：在于不正确地对待了中农。在于在和中农的經濟关系方面采用了暴力。在于忘記了和中农群众的經濟結合不应当建立在强制手段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和中农協議的基础上，建立在和中农联盟的基础上。在于

^① 见本书第 489—497 頁。——編者注